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屈赋新探》之四

屈赋论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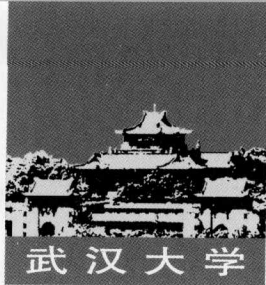
苏雪林著

根澹葉茂 實亦聲洪
山高水長 流風是美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武汉大学
百年名典

《屈赋新探》之四

屈赋论丛

■ 苏雪林 著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屈赋论丛/苏雪林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 12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屈赋新探》之四

ISBN 978-7-307-05912-2

I. 屈… II. 苏… III. 楚辞—文学研究—文集 IV. I207.2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4644 号

责任编辑: 杜七红

责任校对: 王 建

版式设计: 支 笛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wdp4@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40.125 字数: 575 千字 插页: 4

版次: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5912-2/I · 329 定价: 72.00 元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社会科学类编审委员会

主任委员 顾海良

副主任委员 胡德坤 黄 进 周茂荣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俊萍 马费成 邓大松 冯天瑜

汪信砚 沈壮海 陈庆辉 陈传夫

尚永亮 罗以澄 罗国祥 周茂荣

於可训 胡德坤 郭齐勇 顾海良

黄 进 曾令良 谭力文

秘书长 沈壮海

苏雪林 (1899~1999)，现代女作家、文学研究家。曾用名瑞奴、瑞庐、小妹，又名苏梅，字雪林，以字行。笔名绿漪、灵芬、老梅等。原籍安徽太平，生于浙江瑞安。1917年毕业于安徽省立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翌年入北京高等女子师范学校。1921年毕业，次年赴法国留学，先后在吴稚晖创办的海外中法学院和里昂国立艺术学院学习美术和文学。1925年回国。1928年起任苏州东吴大学、上海沪江大学、安徽大学、武汉大学等校教授，一直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1949年到香港。翌年赴巴黎研究神话。1952年到台湾，任台湾师范大学、台南成功大学教授，1973年退休。其间于1964年赴新加坡任教于南洋大学。她的著作颇丰，其中有小说散文集《绿天》，历史小说集《蝉蜕集》，自传体长篇小说《棘心》，散文集《屠龙集》，散文评论集《蠹鱼生活》、《青鸟集》，历史传记《南明忠烈传》，回忆录《文坛话旧》、《我的生活》、《我与鲁迅》，戏剧集《鸠罗那的眼睛》，专著《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中国文学史》，古典文学论著《唐诗概论》、《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楚骚新诂》、《屈赋论丛》，论文集《蠹鱼集》，以及《苏绿漪佳作选》、《苏雪林选集》等，另有一些译作。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出版前言

百年武汉大学,走过的是学术传承、学术发展和学术创新的辉煌路程;世纪珞珈山水,承沐的是学者大师们学术风范、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的润泽。在武汉大学发展的不同年代,一批批著名学者和学术大师在这里辛勤耕耘,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他们在学术上精品、上品纷呈,有的在继承传统中开创新论,有的集众家之说而独成一派,也有的学贯中西而独领风骚,还有的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而开学术学科先河。所有这些,构成了武汉大学百年学府最深厚、最深刻的学术底蕴。

武汉大学历年累积的学术精品、上品,不仅凸现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风格和学术风范,而且也丰富了武汉大学“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的学术气派和学术精神;不仅深刻反映了武汉大学有过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辉煌的学术成就,而且也从多方面映现了20世纪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就。高等学府,自当以学者为敬,以学术为尊,以学风为重;自当在尊重不同学术成就中增进学术繁荣,在包容不同学术观点中提升学术品质。为此,我们纵览武汉大学百年学术源流,取其上品,掬其精华,结集出版,是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

“根深叶茂,实大声洪。山高水长,流风甚美。”这是董必武同志1963年11月为武汉大学校庆题写的诗句,长期以来为武汉大学师生传颂。我们以此诗句为《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的封面题词,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留存的那些泽被当时、惠及后人的学术精品、上品,能在现时代得到更为广泛的发扬和传承;实是希望《武汉大学百年名典》这一恢宏的出版工程,能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和当代中国学术的繁荣有所建树。

《武汉大学百年名典》编审委员会

再版说明

在对《屈赋论丛》一书进行再版加工时,我们只对其进行了必要的校改,有些方面,如译名、注释的体例及一些特定的表达方式等都一仍其旧,以尽可能地尊重这类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著作之原貌。特此说明。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7年10月

《屈赋新探》再版序

关于我怎样开始屈赋研究；我的屈赋研究与那些新旧楚辞学家有何不同之点，已写过好几篇文章了，不必再复。现则说我这部书出版的经过。

我自一九五二年自法国巴黎回到台湾，于无意中摸清《九歌》歌主的属性，便一篇一篇写出来。又写了《屈原》那篇传记，想出版，竟找不到一个书局肯接受。一则篇幅太长，成本太贵；二则我对屈赋解释太新颖，无人能解，书出必无销路，哪个肯做亏本生意。

我为筹出版费，写信托人，自台北到南洋，自南洋到欧美，不知费了多少精神气力，毫无结果。一九七三年，王云五先生得到我的请求函，想他介绍此书给商务印书馆，他说商务不肯要，但他在中山学术文化基金委员会有点主权；将我推荐给该会，听说我的《屈赋新探》将分四集出版，便辅助四集出版费共四万元。以一万元印一集当然不够，我就用来专印第一集，《屈原与〈九歌〉》共印精装五百册，平装一千册。

书出托朋友代销，自己则签名送人，倒去了数百本，尚余千数百本运到台北，托广东出版社出售，数年仅售去十余册，余书无处堆放，塞主者床下，受潮腐蚀。后主者病死，书店关门，我书以废纸论斤出卖，我自己仅保存一二本。一九七四年年底，我筹得六万元自费出版《天问正简》，印了一千六百册。除托熟人销售及送人外，余书也运台北托书店销售。运送失落及腐蚀了一大宗。那书店歇业，余书尚有一二百本，由纯文学书店买去，数年卖不出什么，不能占据书店的空间，就随便擦给熟人，或当废纸卖了。

我又编了《楚骚新诂》、《屈赋论丛》二册。前一本论《离骚》、

《九章》、《远游》、《招魂》。屈赋旧传二十五篇，是连《卜居》、《渔父》计算的。近代楚辞学者又怀疑《九歌》是湘江民族宗教祭歌，时代早于屈原百余年，《天问》见解浅陋，文理杂乱，乃后人胡诌出来的。《远游》多与司马相如《大人赋》文句相同，当是相如以后汉人所作。《九章》又被人举起大斧劈落数篇，屈原作品被这样一裱散，存者已寥寥无几。我的屈赋研究，则替屈原保存了二十四篇，比王逸等只少一篇，自诩为三闾功臣。

我原来的宗旨以这廿四篇解释为正编，其有关屈赋论著自成单元者为副编。《屈赋论丛》便是副编。

这两本书虽编成，没个出版社肯予接受，我自己又再无力印行。幸“国立编译馆”表示愿代印，惟版权须归它。遂以九万元代价，将二书版权卖去，一九八〇年底两书都印出了。我本想书的封面照前二书形式，并各加“屈赋新探”四字，该馆不肯。既售版权，主权在人，惟有作罢。

我的著作，无论文艺性的也罢，学术性的也罢，销路总是欠佳，“国馆”收购我那两册，本是蚀本生意。忽忽廿余年，大陆及海外忽来函索此四书。全部重印无此财力，况后二册已售版权，不能重印。乃由文津出版社用照相翻印前二本，即《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再向“国立编译馆”购买《楚骚新诂》、《屈赋论丛》各一百册，凑成全套，以应急需。后二册的封面与前二册不一样，就是这个原因。

苏雪林

一九九二年四月于古都春晖山馆

自序

我的《屈赋新探》全部文字脱稿已久，第一集《屈原与〈九歌〉》，第二集《天问正简》，已于前两年内先后出版，第三集《楚骚新诂》，亦已面世，剩下第四集，也是最后一集，便是这本《屈赋论丛》，也非叫它出来与世人见见面不可，所以只好又灾梨祸枣一次了。

这部论丛所收的是些自成单元的有关屈赋的论著，长短不一。我初写新探时便拟了一个计划，以屈赋疏解为“正编”，这类论著为“副编”。但前二集疏解是陆续出版的，忘加“正编”的名目，因之将本集“副编”之名也取消而题之为《屈赋论丛》。两者虽无正副编之名，却有正副编之实。

或者有人说你的书解释屈原作品也算详细，又要出这本丛刊，何为？人家对你的正编多不感兴趣，又来个副编，谁又耐烦读，你出这集书岂非白费精力？不知我这个副编是与正编相辅相成的，没有副编，正编文字是难得弄明白的。因为正编各篇文字，字数的多寡，篇幅的长短，虽不能完全一律，至少要差不多，庶可搭配平均。但有些问题非仔细分析不可，譬如《离骚》、《天问》均有昆仑，这个问题非常复杂，也非常重大，正文无法解释清楚，只有提出另论。本集所收都是这类文章，昆仑不过其一例而已。

我这部《屈赋新探》全部建筑在域外文化问题上。没有域外文化分子，屈原作品即无法阐释，我这部书也就写不成。域外文化证据在我这书中虽其多不可胜数，还要统一才行，假如前后矛盾，自相冲突，首尾不能相顾，那么证据便失去其可靠性，既失去其可靠性，则证据虽多，也不会发生作用。我在第一集《屈原与〈九歌〉》自序中便曾冒昧宣言：“我这部《屈赋新探》一百三四十万字，（第一集自序谓

全书共一百三四十万字，今四集出齐，共一百八十万字）彼此贯通，一线到底，绝无穿凿附会，矫揉造作之嫌，可说是世间最自然的考证。”这一段话用之于三集正编可，用之于这集副编亦可。“彼此贯通，一线到底”八个大字是值得注意的。我对这个研究之敢于自信，也就在这八个大字上。虽然其中有若干篇已收入其他著作中刊出一次或二次，但现在我的《屈赋新探》四集都将完全问世，则将它们收集一处出版是应该的。不过为了节省篇幅，有若干篇虽已在第一集中预告，也只好刊落了。

现在请将本集所收论著，向读者作一提要式报告。

域外文化曾两度来华，30年前，我写《昆仑之谜》便已提出这个见解。第二度来华的域外文化是在战国中叶，即屈原的时代，我在第一集《屈原与〈九歌〉》的《自序》和《屈原评传》第六章《屈原的学术思想》，言之已详，现不再赘。第一度来华的域外文化为时甚早，想尚在夏商前。苏末文化发展极早，开西亚之先河，这民族后忽消灭，或有一支携其文化，间关万里，来我中华。（这是已故友人赵尺子先生给我的启示。）这一支苏末人从哪一条道路来的呢？我以前也不知，及写《屈原评传》论到他的学术思想，见山东半岛渲染域外文化色彩最为浓厚，好像泰山居世界大山地位；齐之称为中国，由于脐之一字；齐地八神即日月五星之祀，也即是西亚七星坛所奉者。于是恍然知这支苏末人当是从海道来，至山东半岛而登陆，并在半岛建立了一个雏型的西亚国家。我于是写了《域外文化两度来华的来踪去迹》、《域外文化第一度来华的根据地》与十余年前所写的《我国古代移民通商沟通文化之伟绩》刊于本集开端地位，使读者先获得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来我们山东建国者当即是所谓鸠爽氏、或季荊氏、逢伯陵氏、薄姑氏、莱人，时久势衰，早已被土著中国人所消灭或同化，所以我并没有认苏末人为我们的祖宗，请读者释虑。

《我研究屈赋的经过》这篇近两万字的长文，大概是1962年间所写，发表于《作品》第3期第7卷，后收《文星十书》《我的生活》之内。这篇文章将自己如何与屈赋发生关系，如何一步一步地探讨，遭遇些什么困难，获了些什么心得，均巨细无遗地写出。该文第五段又将我

研究的方针和所走的路线都提出向读者报告，可算我这部《屈赋新探》研究方法的浓缩，更向国人提供了一个观念，就是民间文化与整个中国文化的关系。本欲以此文为本集代序，不过自1962年至今又过了十四五年，关于我自己这部书的话又多了起来，非另行写序不可，只好将此文置之集前，当个导论。

这些论著写作时间与正文疏解差不多同其长短，甚至更早。譬如本集里的《〈九歌〉中人神恋爱的问题》写于1929~1930年间，距今已将半个世纪。我对于宗教神话及民间礼俗素有偏爱，读这类书较多。为了不满于当时游国恩所谓《九歌》内容系言情分子与祭祀分子所凑成，便撰写了这篇文章，不过一时高兴，丝毫也没有“问鼎”楚辞研究的雄心。因为我觉得楚辞这门学问太高深了，浅学如我者哪敢尝试？原本有二万字左右，今删去一半篇幅，以人神恋爱文字为主。

我之真正着手于楚辞研究始于1943年，一开始便发现域外文化这条线索，写了一篇《〈天问〉里的旧约创世纪》，接着就写地理性质的《昆仑之谜》，这是一个有关中国古代地理问题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我很早便说真正昆仑是在西亚，即是坐落在阿美尼亚高原的阿拉拉特(Ararat)，我国的昆仑、印度的阿耨达(即须弥、苏迷卢)、回教天园、希腊奥灵匹司，还有些别的国家的仙山，都是阿拉拉特的翻版。我又很早便说泰山古时已居昆仑地位，及“脐”为大地中心的观念。又很早便提出“中国”一词具有世界性，今世界国家中国之称早已消灭，独我国尚复拥有。又说以于阗南山为昆仑，乃汉武帝所钦定，不能作准。在后藏新疆间一带大丛山强截一段为“昆仑山脉”乃近代德国地质学家洪博德(A Von Humboldt)所为，更不能作准。又力辟昆仑为山祖，中国全国之山皆发源昆仑谬说，希望学校教科书及坊刊地理图，不再盲从而有所矫正。

这几个问题，三十余年前一提出便成定局，通贯全书，愈证愈明，今日言及，并非敢于自诩头脑之明敏与眼光之准确，不过用以说明这些证据早已存在那里，无待辗转搜寻及缭绕的傅合，我的《屈赋新探》的证据都属此类，《昆谜》是最早的例子。

《昆谜》一书虽写于1943年冬，1956年且蒙“中央文物供应社”代

为出版。其间关于阿拉拉特山与四水篇则系 1976 年所改作，经过情况见《昆谜》自跋之二。因为这篇文章我自己甚为宝爱，既其间有改作，不妨在此重刊一次。

《离骚》、《天问》都有大片段关于昆仑的话；《远游》第二大段开始时缺失二句中必有“昆仑”字样，《九章·涉江》也有“登昆仑兮食玉英”之句，这篇《昆谜》当作哪一篇补充资料好呢？因文章太长，特移之于全书之后，与《希伯来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并列为压卷，这样子于全书的体例似乎比较妥当一点。

另有一篇短文也与地理有关，就是《黄河之水天上来》这一篇。古代世界各国每以其国一条最大最长之河流称为圣水，为生命水，说它策源天上，降到大地上时，先入地府而后复出人间。又谓河为裁判善恶的公平正直之神。西亚最长大之河为幼发拉底斯，称以“河”（River）而不敢名，我国黄河古亦称“河”。西亚以为河能裁判善恶，有掷人于河以沉浮定有罪与否者，有指河起誓者。希腊指为誓者有司蒂克斯（在冥界），印度则恒河，中国则黄河。据《山海经》黄河策源幽都，魏晋时黄河策源天上银河之说渐盛，是以唐李白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句。

《印度恒河诞生因缘》是说大神自天上银河引水下降，先入地府再出人间的故事，写得非常伟大而美丽。原来故事见印度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耶那》（*Ramayana*），我戏以佛经体裁译之，发表于《畅流》第 8 卷第 10 期。那时糜文开先生正在撰写印度文学的两大史诗部分，自《佛藏》中百计搜觅，仅得《十奢王经》、《未名王生经》几句零星记载，见我文大惊，以为我读到什么佛经的秘笈，写信给《畅流》主编吴裕民先生，再三探问，及知不过是我的游戏笔墨，始一笑而罢。——这是一个很有趣的回忆，故附记于此。

《乾坤浮水水浮空》也是有关地理甚至天文的一篇短文，所论为“原始深渊”，就说未有天地之前充塞整个空间者乃是一片无边无底的大水。这个奇怪的宇宙观念，源于西亚的《创世史诗》，（也许比《史诗》更早）传衍及于全世界。埃及古时亦有，惜言之不详，希伯来《旧约圣经》关于“深渊”字样不计其数。有几幅古代以色列人世界观

的图。有一幅天和地都在深渊里，有一幅天与地半浮于深渊上。（见港译《旧约·创世纪》）中国古人曾说：“天载水而行”，“天之表里皆水”，就是天地皆在深渊中的说明。《九歌·少司命》“纷纭六幕浮大海”，苏轼《浮山洞》“乾坤浮水水浮空”也是天地皆浮深渊上的意思。苏轼诗的观念是由于佛经而来的，《起世经》言“地住水上，水住风上，风依虚空”。苏诗之所云我们中国人还能懂，至于《少司命》“纷纭六幕浮大海”便说不出所以了。“六幕”即六合，天地并言。“大海”若指为海洋，则海洋系在地面，试问我们这个大地怎可浮在自己海洋上呢？我看这个“深渊”之说不但我们中国人自古至今不知所谓，外国学者除研究西亚文化之人，恐明白这个道理者也还是很少。我就看见有些外国学者解释《旧约》深渊为地面深海，哪怕他们已见过古以色列人世界观的图，不懂还是不懂。我觉得这篇短文关系有相当之大，是以要在序文里郑重提出。

关于我国历史典章制度方面问题的有《三一与泰一》、《封禅论》。（原题《封禅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先论前篇，“三一”即天一、地一、泰一，也即是秦始皇时代的天皇、地皇、泰皇。中国读书人始终不知道泰一与泰皇为何神，以为是人皇。我则说泰一与泰皇是水主。因为古时均有三分宇宙的大神，即天、地、水之主。这种信仰传到我国最早当是三官教；三一及三皇之起反较晚。我国学者都以为三官之教乃民间低级信仰，经黄巾利用作造后，与什么八卦、白莲等邪教同科，为士大夫所不齿，哪里知道它的来源是这么远而历史又这么古？自多神或一神教兴起后，三分宇宙大神在别的国家都逐渐变质而混合于他神，人们已不大提起，独我们中国至今仍有三官的祭典，可见中国民族善于保存文化，颇值称道。

不过《九歌》的东皇泰一与汉武帝所隆祀的泰一，其性质又与上述三分宇宙大神不同，泰一并不限于水主而为包含一切神而存在者，其义为“大一”，相当于西亚的“倍儿”（Bel）。历来学者对泰一的意义从无满意的解释，实为中国历史及宗教史的耻辱。我以为自己这篇论文，篇幅虽不多，却语语扼要，深愿史家注意。

《封禅论》也是一篇极有关系的论文。过去君主时代，封禅是国家

大典，其性质说是王者易姓改制，成功告天；其来历更不清楚。唐宋以来，儒家都说六经不见封禅之文，当是秦皇汉武好大喜功，立此制度以为炫耀的。学问渊贯如顾炎武也说仙论起于周末，鬼论起于汉末。其实经书里关于封禅之事有好几条，如《春秋左传》及《公羊传》之《郑伯归祊》，《礼记·礼器》“齐人将有事于泰山，必有事于配林”。又《论语》孔子反对季康子旅泰山，孟子劝齐宣王勿毁泰山下之明堂皆是。读者自己不解，反以为经书不载，无乃可笑！封禅虽系大典，举行却非常不易，好像有一种危险性，这危险性是什么，中国人又知道了，我以为就是禅梁父。梁父乃死神所在地，帝王封禅是企图将来升天，天门由死神把守，想升天非取得死神同意不可。死神本来森严可畏，又是公平正直之神，你德行上若有亏欠，谁又敢和这位神打交道呢？

《汉纬书十纪说之由来》是一篇关于历史时代的文字。汉代纬书家说自开辟至于获麟已经历了二百二十七万岁，比地球实际年龄短之又短。但我们一想到欧洲一百年前的学者尚说自开天辟地到他们时候不过六七千年，两下一比较，能不感觉十分有趣吗？

关于神话故事与民间传说的有《深渊巨魔锁系故事之衍变》、《天上地下的岁星》、《谈文昌帝君》、《谈二郎神》等。

深渊巨魔故事出自西亚《创世史诗》，时代之古当在六七千年以上，总之，比我国历史古是不必说的。深渊巨魔即原始女怪与天神战而败，而被锁系杀戮的故事，竟传衍遍天下，到我国为大禹锁巫支祈、李冰锁孽龙，讹传为李冰子的二郎也有锁龙斩蛟之事，更有僧伽在泗州锁水母，水母也即是巫支祈。普世相传巨魔皆为男性，我国水母则为女性，直指西亚《创世史诗》之本源，我国何以知道得这么清楚，可谓咄咄怪事，也可见我国民间文化价值之高。

我国太岁为凶神，凡以太岁为诨名者均带凶煞气。而“太岁头上动土”一语，至今人人挂之口头却不能知其本来意义，笔者在唐人笔记中搜出许多例子，才知道是何缘故。

文昌本身为蛇，为他原属天文上的长蛇座，他喜爱姓张，则又长蛇座中有一颗星为张，乃二十八宿之一。二郎前身为猎人星座，所以泰山诸郎无不好猎。二郎的猎犬和弹弓，也是天文上的星座，并在猎

人星座附近。

二郎神的“劈山救母”，至今尚脍炙人口，舞台银幕搬演不绝。不过总认为是一种民间故事，不登大雅之堂。谁知巨灵擘山见扬雄《河东赋》、张衡《西京赋》，而“十巫救母”则见于《山海经》。十巫均死神颡项之子，二郎想必原在这十巫内，变为兄弟七子乃是稍晚之事。本来“擘山”导致洪水祸是魔方的事，“救母”是神方的事，民间口耳相传，竟混而为一。笔者曾假设“劈山”、“救母”乃是两出相连的神剧，传诵人口太久，变为“劈山救母”同属神方之事，并为二郎之功了。“救母”事既见《山海经》，乃系来自域外，“劈山”当也与西亚《创世史诗》有关，乃《史诗》之外一章。西亚《创世史诗》实集合各种来源不一的杂乱篇章而成，今本《史诗》已无擘山事，其所根据之篇章则当有。盖巨灵擘山与共工触倒天柱为同一母题，共工事既来自域外，则擘山事当亦来自域外了。

关于《国殇》几篇讨论文字本不想收录，但第一集已预告，若刊落则无以向读者交代。真理以讨论驳辩而明，收此集中，《国殇》的性质将愈为明显，是以不忍舍弃。

《远游》部有《〈远游〉与〈大人赋〉》、《古人以神名为名之习惯》。

自清末廖平说了几句怀疑远游的话，胡适、陈鍾凡、陆侃如、游国恩都说《远游》非屈作（游后又取消前说），他们都说《远游》是抄袭司马相如《大人赋》的。相如西汉人，那么，《远游》是汉代人所作的了。笔者以前也深信此说，在国立武汉大学教中国文学史关于楚辞部分的讲义，说的话也和这几位学者的话相同。但来台后第二年，即1953年，应张晓峰先生邀约，为他所办的学术季刊撰《屈原》一文，即大胆宣布《九歌》是整套神曲，《九歌》歌主是隶属于同一集团之神，并大胆宣布《离骚》、《天问》、《远游》是屈原三大杰作。我说：“我们的大词人屈原在《离骚》里炫耀他绝代的才华，在《天问》里则显露他渊博的学识，在《远游》里又表现他精微深奥的哲学思想，好像他故意经营这三篇大文章来反映他自己整个人格。”《远游》哲学思想是什么？我又以它与《离骚》并论，说道：“《离骚》和《远游》以战国时代的儒家、道家、阴阳家的学问，屈原更以自己的历史知识糅合在一

起，形成一种思想系统。”我那时尚未研究出西海仙洲的事，所重仅道家思想，也未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拿来与《远游》仔细比勘。直到六七年前动手写这篇文章，始得明确的结论。但回想1953年写《屈原》时所作的预告实在冒险，因《远游》有两简文字与《大人赋》完全相同。抄袭之事，两文中必有其一。假如找不到充实的证据，则言《远游》抄袭《大人赋》者将获胜诉。幸而我读《大人赋》发现司马相如对域外文化分子完全不解，只在屈赋里死袭硬抄，被我捉住的赃证达二十余项，这才将三间与司马这件官司弄了个水落石出。

古人以神名为名的习惯，是解释《远游》韩终问题的。被舜窜逐的共工与和颛顼争帝的共工；舜庭乐师夔与舜廷独脚音乐神的夔；射日之羿与有穷后羿；天文上尾宿的女岐与浇嫂女岐等等使古人困惑不已的问题，也得解决。

除了这几篇比较重要的，皆属杂碎文字，以其皆与域外文化有关，立一杂俎类附书末当作附录。

有人以我这个集子里的话重复太多为病，我自己也极为厌倦。不过这些文章写作既非一时，发表又非一地，由于我这个研究是从来未经人道过，怕人不解，未免多说几句，现在结集成书，想加以删削改窜而工程太大，着手为难，只有听其自然了。再者，读重复话也有好处，就是可以加深印象。三十余年以来，我这几句话，翻来覆去，说了又说，自以为晤絮得尽够，谁知人家仍褒如充耳，这都因为我说的话人们从未听过，未免太陌生，以前所见我的篇章，又东鳞西爪，莫窥全豹，无怪如斯。今书已出齐，可作通盘检讨了，我再说几句重复话，作为提纲之用，当可更助了解吧！

现在，报告的话已说完了。我尚有几点意见，愿向读者提出。

其一，不可轻视域外文化及其诸神。我这部《屈赋新探》已出版过三集，读者每以我中国文化承之域外之说为憾，以为必须说中国文化乃我们闭门自创，始可保持文化血统的纯粹，谓其混有外来分子，乃是对中国文化莫大的亵渎与不敬。假如说中外文化分子有其雷同之点，那也可说是“暗合”、“偶同”，甚至说是我们传去而非外面传来。我们基于民族自尊心作此论调，原无足怪，不过这却不是寻求真理